

中共党史视野中的忧患意识

□祝彦蒋正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将其提高到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相同的高度,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忧患意识的高度重视。回溯建党97年来的奋斗历程,每逢重大转折关头,我们党总是能够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戒骄戒躁,使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继而成就自己的伟大事业。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1949年3月5日,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醒:“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鉴于此,他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为各级党委会提出了十二种工作方法,其中就有强调“力戒骄傲”,指出:“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敲响了忧患警钟。然而,“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他们两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都曾为革命出生入死,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了严刑拷打,但在革命胜利进城后开始变得骄傲自负起来,贪图享乐,最终被处以极刑。这一处理,在全党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还召开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在商定国歌时,有个别委员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建议进行适当修改,毛泽东在会上拍板指出:“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面对胜利和成功,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非常清醒地谆谆告诫全党:“即使我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明显增强,一些片面、盲目地夸大中国成绩和成就的言论甚嚣尘上,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将“忧患意识”提升到了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高度,明确指出:

反特权方能得民心

——重温邓小平《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王鹏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温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仍觉振聋发聩,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把反特权摆在关系“党的威信”的突出位置,作出了反对特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战略部署,既找到了端正党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突破口,也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障。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受到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搞特殊化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大兴土木,为个人扩建或新建高级住宅;有的巧立名目,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的纵容子女谋取私利,甚至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这些行为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极大损害了党的形象。为了整肃党风,在邓小平亲自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为了让《规定》顺利执行,中央专门召开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邓小平亲自进行动员。

他首先提出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切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并进一步指出,“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可以说干部特殊化相当普遍,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他深刻分析道,特殊化的后果就是脱离群众,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上行下效,这样就带坏了风气,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可以看到,他把干部搞特权看作影响党风政风民风的重重大政治问题,这是非常深刻和有远见的。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当时以反对干部特殊化作为切入点,着力反对各种特权,纠正不正之风,抓住了要害,使党风很快得到扭转。

特权的产生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客观基础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特权思想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但是,为什么有些干部甚至一些战争年代走过来

的高级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廉与腐、苦与乐的关系,反而去公开谋取特权和私利?邓小平深刻分析了背后的思想根源和客观基础。

主观上,放松了党性修养,“现在在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邓小平用“做官当老爷”短短五个字,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特权现象的思想根源。执政之前,我们的干部是抱着革命的目的来的,满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是身先士卒的革命者。现在我们党处在长期执政的历史地位,干部手握公权力,“当官”的味道越来越浓。一旦忘记了入党的初心,很容易腐化起来,成为“官老爷”。加之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等特权文化根深蒂固。受这些腐朽思想影响,一些党性不强的干部容易把权力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利用公权谋取私利。

客观上,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就提出反对特权,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提出,要警惕党内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并为此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比如,住房要交房租、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等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制度遭到破坏。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实在是因为顾不上”,出现了党纪国法不健全的现象。与此同时,已有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干部搞特权后得不到及时纠正,导致一些干部无所顾忌。这些客观原因,助长了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滋生蔓延。

反特权的关键是高级干部带头

反特权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一场“刀刀向内”的自我革命。邓小平在反特权上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寄予厚望。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因此,他希望高级干部带头,“解决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高级干部着手”“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

带头制定好规章制度。邓小平十分注重制度建设,他认为制度更稳定、更靠得住些。为此,他亲自推动建制度、立规矩。他大声疾呼,“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我们党随后逐渐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探索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置于监督的探头之下。

带头执行好规章制度。制度再健全,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好,就会成为“稻草人”。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的执行力,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规定一经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在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支持下,1986年几个高干子弟在“严打”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带头恢复和发扬好的传统。干部特殊化是我们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他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特权也没有休止符。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鲜明地展示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可以说,反特权仍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的重要内容。

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

中国共产党是在强烈的内忧外患背景下成立的,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体现出在忧患中战斗奋进的政党品质。1923年2月7日,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唯独安源路矿工会保留了下来,并屡屡挫败反动势力的阴谋,其主要原因就是安源工会时刻不忘强调忧患意识:“安源工会眼见全国工会的失败,立取守势,并劝诫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一旦在忧患意识上稍有懈怠,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到达武汉后,党内一些同志因此骄傲起来,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在红军转战偏远的农村时期,党内滋生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为此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专门撰文批评了“打胜仗就骄傲”“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错误思想,确保了红四军能在困难当中继续奋斗,成功开辟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央苏区。

随着中央苏区先后取得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党和红军内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导致中央苏区沦陷,革命力量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落脚陕北后,党中央总结教训并作出了“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的正确总结,但无奈党内仍“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一些同志过于乐观,放松警惕,在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遭受重创。1944年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深刻总结了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因骄傲腐败最终导致覆亡的教训。毛泽东对此文十分重视,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印发全党,旨在“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通过整风教育,忧患意识在全党得以树立起来,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付克义

“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干事创业需要“钉钉子精神”,坚守理想信念和锤炼政治品格同样也需要“钉钉子精神”。在这方面,革命先辈成仿吾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驰而不息厚植理想信念

追求进步,点亮理想之光。出生于1897年的成仿吾自幼就追求进步、爱国爱乡。他13岁留学日本,主修造兵科,其间立下了科学救国之志。然而,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让成仿吾认识到科学救国难以实现。于是,1921年他联合郭沫若、郁达夫等有志青年成立了“创造社”,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活动,志在唤起民众的觉醒,推翻旧社会,建立民主科学的新社会。之后,成仿吾又于1926年到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到达欧洲,于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坚持学习,筑牢信仰之魂。成仿吾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认识得益于1926年在广州与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接触。之后他便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

著作,自觉并长期坚持学习,且尝试运用相关理论对社会革命进行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仿吾专门奔赴欧洲。他学习马克思主义非常真诚,哪怕在崎岖难行的长征途中,依然带了许多马列经典书籍随行。

坚守真理,深扎信念之根。成仿吾说:“良心不死,终当可敬;士气不衰,总有可为。我们要存此心,为正义和真理而战。”坚守真理,是成仿吾坚定革命意志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一辈子的人格操守。“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仿吾遭到迫害,被游街示众、关牛棚,还被打断过两根肋骨,但是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党的事业。他撰写《长征回忆录》,再现了长征中那些崇高壮烈、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为研究长征精神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锲而不舍做强红色教育

富于革新,坚守教育有实才。成仿吾自1934年担任中央马列学院高级班教员开始,便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他是陕北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的主要创建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的领导。成仿吾积极探索在战火中办学的经验,实行革命理论和革命实际相结合、教育和政治相结

合、教与学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具有革命特色的教育思想,从根本上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有政治远见、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优秀干部。

不惧艰难,化解困难有实招。延安时期,开办红色学校异常艰难,缺干部、缺校舍、缺物资,几乎都要白手起家。面对这样的境况,成仿吾一方面用开脖子带领一帮人自建校舍、自修操场,一方面开动脑筋解决办学中遇到的难题。在解决师资问题上,既向党中央请求增派,也自己积极培养。在教材问题上,组织教员在总结过去革命经验基础上编写教材。

以育人为,关心学员有实意。成仿吾视学员如子女,对他们甚为热忱、贴心和爱护,让他们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成仿吾也因此而得“妈妈校长”之称。他注重在思想上引导学员走上革命道路,常用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勉励学员。他也注重在生活上关心学员,帮学员盖被子、关窗户。他还注重与学员生活在一起,一起劳动、一起住窑洞、一起睡地铺。

持之以恒锤炼政治品格

不断锤炼正派憨厚的政治品行。丁玲评价成仿吾:“一个土里土气、老实巴交的普通人,一个经过长征的革命干部、红军战士、正派憨厚的共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其一,要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也不掩盖。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针对党内存在着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鲜明地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并掷地有声地作出宣示:“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视野和英明决策,更表明了我们党要把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深深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其三,坚持以史鉴戒,常怀忧患之思。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借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为之于未,治之于未乱”等名言古训,告诫党员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其四,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做到“三个决不能”。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等,是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必须“慎终追远,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以“赶考”心态走好新的长征路。



革命先辈成仿吾的“钉钉子精神”

产党员。”成仿吾的正派憨厚体现在他不贪图名利上。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问成仿吾在解放以后打算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回答“搞教育”。成仿吾的正派憨厚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激情上。1978年,已经年迈的成仿吾依然充满工作斗志,赋诗道:“老夫贡献虽渐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不断锤炼维护大局的政治担当。1931年,成仿吾根据组织安排到鄂豫皖根据地从事革命工作,在那里他目睹了张国焘所推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和右倾逃跑主义等诸多错误做法。为挽回损失,他不顾个人安危,遵照鄂豫皖省委委派于1933年经上海到瑞金向党中央状告张国焘。1934年,党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

不断锤炼永无止境的政治操守。成仿吾非常重视马恩著作校译工作,他先后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且是直接译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为中文。成仿吾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是1929年,最后一次翻译是1975年,时间跨度非常大,可见其对《共产党宣言》精准翻译的执着。朱德对第五次译注有过评价:“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

